



HEYINGQIN ZHUAN

XIONG ZONGREN ZHU

何应钦传

山西人民出版社 熊宗仁著

晋新登字6号

何应钦传

熊宗仁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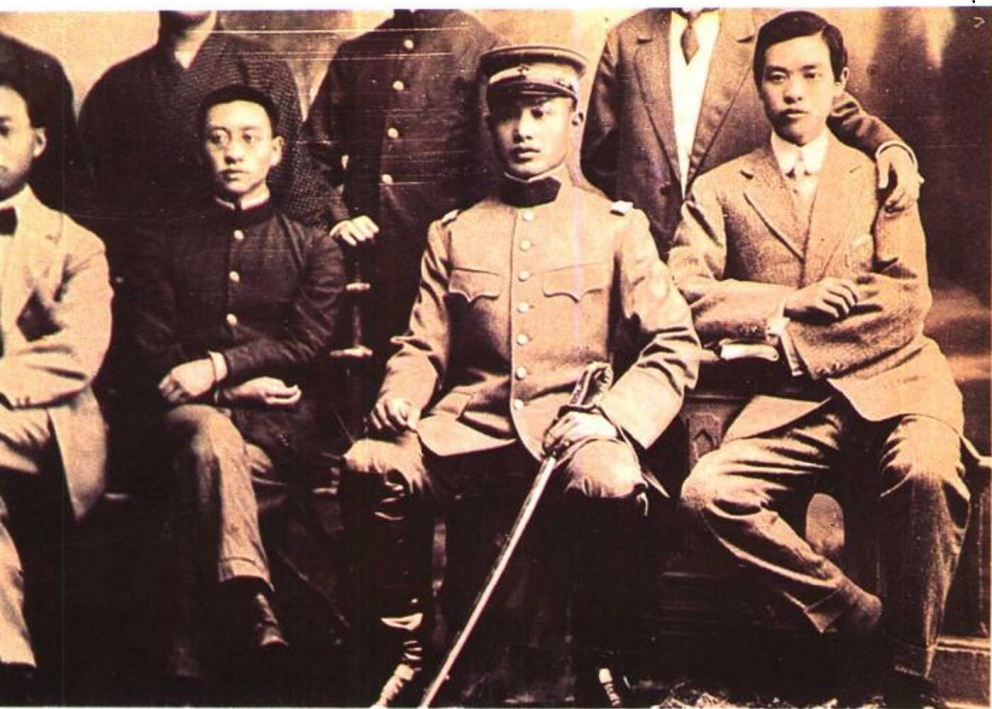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9.625 字数：592千 插页：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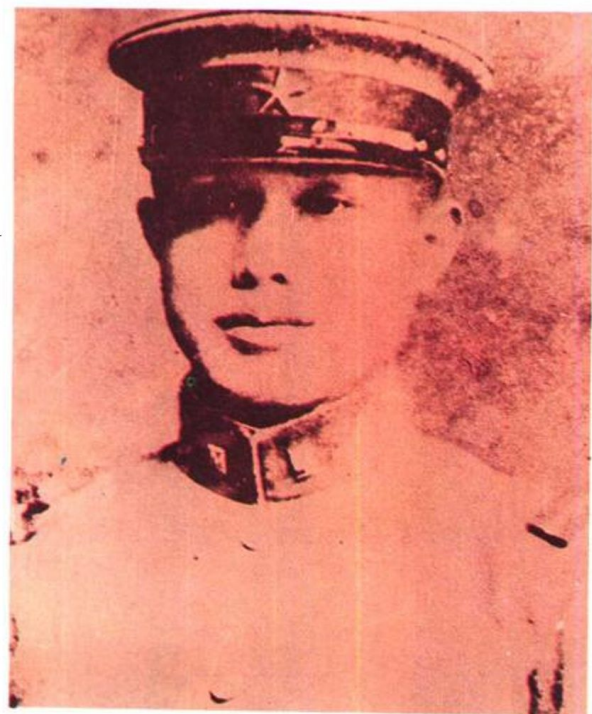
1993年1月第2版 印数：1—10000册

上下册 ISBN7—203—02323—0/D·428 定价 18元

(内部发行)



1916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何应钦与贵州留日同学留影。



1914年在日本陆军宇都宫59联队实习时的何应钦。



1917年任黔军第四团团长兼贵阳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何应钦与新婚的妻子王文湘在贵州家中留影。

1917年7月至12月任贵州“讨逆军”第一支队参谋长时的何应钦。



1923 年何应
钦与夫人王文湘在
上海时留影。



1924 年 6
月 13 日，孙
中山任命何
应钦为黄埔
军校总教官
的委任状。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何应钦（左）、蒋介石（中）、王柏龄与孙中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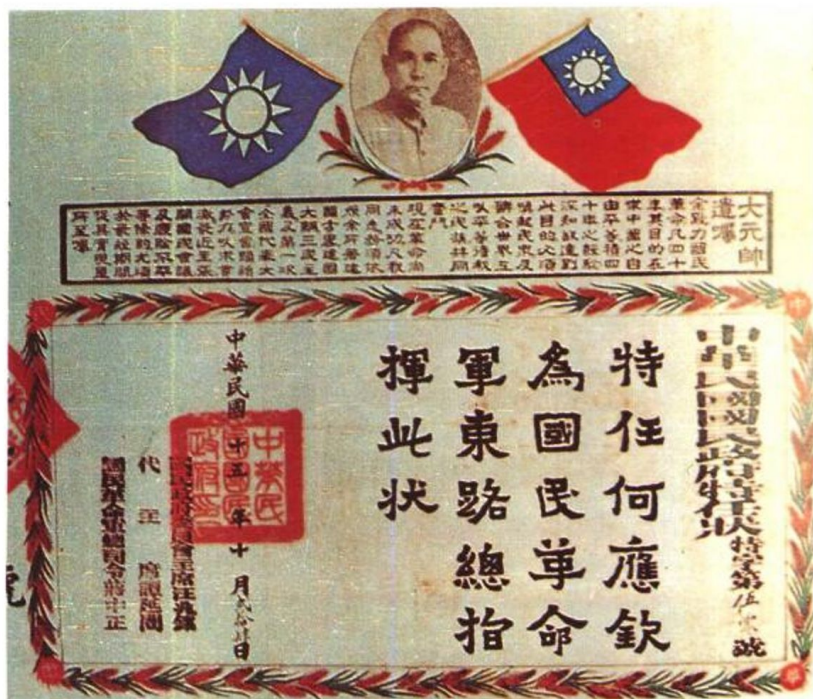
1925年3月，何应钦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部属在追悼孙中山大会后留影。





1925年
10月14日，何应钦
与蒋介石同
攻克惠州的
东征军指战
员在惠州城
下合影。

1926年
10月，国民
政府特任何
应钦为国民
革命军东路
总指挥的特
任状。





1930年1月10日，
何应钦就任中国童子军总
会副会长(会长为蒋介石)
兼中国童子军总司令时留
影。

1929年1月25日，
何应钦出席国军编遣委员
大会闭幕时与蒋介石、冯
玉祥、孔祥熙、李宗仁、阎
锡山、李济深等合影。



1930年就任
军政部长后打猎归
来的何应钦。



1931年4月，
任南昌行营主任指
挥对中央红军进行
第二次“围剿”时的
何应钦与幕僚合
影。





1933年至1936年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担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时与夫人王文湘在居仁堂合影。

1937年5月，何应钦夫妇与养女何丽珠及四弟何辑五合影。



序 言

吴雁南

熊宗仁同志撰写的《何应钦传》一书，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的成果。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自19世纪末他提出“振兴中华”这一振奋人心的号召起，近百年来，亿万中华儿女前仆后继，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繁荣昌盛而自强不息、奋斗不已。从很早的时候起，孙中山就宣告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那时以来，国共合作、振兴中华，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历史潮流。

何应钦，作为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人，曾经是中外瞩目的人物。他高龄至98岁，跨越了近现代中国的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代，他的一生，紧紧地同20世纪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对于这样一位时间跨度长、经历曲折、复杂的国民党政府要人进行研究，无疑是有很难度的。

熊宗仁同志是近十年间史坛上突起的中年史学家。从1980年起就千方百计搜集何应钦的史料，去伪存真，精心考订，尊重史实；力求言必有据，实事求是；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架，观点、论断不囿于成见，言人之所不言。

直书、求是、独见，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衡量一部著作的重要尺度。用这个标尺来衡量熊宗仁同志的《何应钦传》一书，应当说，这是一部得力之作。

1988年9月于贵州师范大学

前 言

何应钦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统治中国时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军政核心人物，也是国民党军形成、发展及衰败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高级将领。他活了整整98岁，纵贯近现代中国的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历史时代。特别是1925年至1949年间，他是中国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主角或重要角色。



对何应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其意义远不只局限于一个历史人物。

首先，研究何应钦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从一个侧面对一个世纪来中国政治、军事轮廓的勾勒。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中的社会巨大震荡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国内战争及民族战争的风雨沧桑，一一会在何应钦活动的历史舞台及他所扮演的角色身上有所折光。何应钦去台湾以后，虽不再参与决策，但始终是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及对外交往方针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吹者。研究他去台后的活

动，可以透视40年来海峡两岸隔绝、国共两党对立状态下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政策、策略思想及其成败得失，有助于对台湾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晚年何应钦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对社会主义的反对虽然并未稍改，但他坚持中国必须统一的主张，也流露了思乡的眷恋之情，反映出中华民族心理文化上无法斩割的凝聚力。

其次，何应钦在国民党党、政、军中每一次地位的升迁浮沉，总伴随着蒋介石统治权力的得失消长和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何蒋关系的冷暖亲疏，远非个人之间的利害成败所致，实是同国民党中央系的历史命运以及蒋氏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相连，同时，也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及两党的长期对立相交织。何蒋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反映了研究国共关系史和国民党党史所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

再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研究历史人物时，无论对创造伟业丰功的英雄，还是对沧海横流中的奸雄，总是无条件地把历史必然性的规律加以片面化、绝对化，有意无意忽视甚至抹煞了构成历史必然性的那众多偶然性的环节。历史虽然给生活在相同条件下的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命运的公平的机会，但不失时机地使自己抓住那稍纵即逝的契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踞于群众头上的治者，都有超人的把握机遇，甚至制造机遇的能力。何应钦是一个生逢其时，善于发现、利用和制造机遇的好手，同时，又是官场上种豆得瓜、因祸得福的幸运儿；但是，历史对他的惩罚却往往又随机遇的恩赐旋踵跟进。他短暂的“大将”之星，早已殒落在人民革命的大海之中。这正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其漫长一生的悲喜剧中所显示的无可抗拒的威

力。

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价何应钦，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有助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总结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体现用历史眼光看待历史人物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也许，通过对何应钦的研究，沟通海内外一切对何应钦其人其事感兴趣的人之间的联系，共同用发展着的历史眼光，反思既往，会有所裨益。

二

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何应钦呢？

历史人物都是从属于或代表某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即他的一切活动，总要代表其所属的阶级利益。无论他意识与否，他都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何应钦自然不能例外。但何应钦首先是他自己，而不是他所隶属或代表的阶级或利益集团本身。何应钦只能以其特有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在十分确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下，反映他所从属者或代表者的某些共性，而不可能是全部的共性。这就是笔者在《何应钦传》中所力图要表现的何应钦。

毫无疑问，评价何应钦的功过是非，任何人都会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即便有人想超然于政治之外，也是不可能的。但政治在历史上总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恒量，评价历史人物所使用的政治尺度，难免不受某一时期政治需要的影响。这是史学的参与功能使然。笔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何应钦其人其事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作具体

考察，以再现其真面目，便是尊重历史。对此，海外史学界同仁中定会有所非议，并不奇怪。对同一个何应钦，对他所做过的同一件事，因立场不同、视角迥异，结论自然截然相反。

笔者以为，评价何应钦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标准。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活动的客观后果，是对中国历史起了促进作用还是起了促退作用。这种作用，归根结蒂应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其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当然，政治标准与历史标准不应对立，但并不总是一致的，况且，历史发展的检验远比政治的检验更客观，需时也更长。何应钦一生的时间跨度大，足迹斑驳陆离。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何应钦，对何应钦所做出的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情，都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对他一生的评价中，也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情况，将是不可避免的。

道德标准从来就是评价历史人物中不可缺少的方面。所不同的是，谨守传统道德的藩篱，或者弃旧扬新；囿于政治标准，以政治品质来代替个人生活品质，或者承认其联系也不否认其差别。勿庸讳言，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所负载的传统文化的情性都太过沉重，都出现过造神与信神及彼此相互绝对否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偏狭的传统政治扭曲人性的表现。何应钦自己已经被扭曲了，而研究何应钦者似乎一时也难摆脱这种传统情力的干扰。对于似已认定为专事制造历史黑暗的何应钦，人们往往以他政治立场的反动，必然伴生道德的堕落和生活的腐败的公式来描摹渲染；而一些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极端赞颂何应钦的研究者，则更伴同着他各种

“美德”的绝对褒誉，有意无意忽略或剪裁了何应钦人格中的另一面。于是，坏便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好便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研究和评价何应钦这样一个经历复杂、性格多面的历史人物，如何使政治标准、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有机结合，既是难题，也是关键。

三

在何应钦一生影响重大的历史活动中，他塑造自己形象的材料，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两对矛盾，即反共的主线，依附性与权势欲之间的矛盾、对社会及官场的适应性与个人品格之间的矛盾。

何应钦对中国历史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恰恰始于他追随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而又背叛了国民革命。从1926年他支持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到1987年他逝世为止，他历史活动的主线都是反共，而且其态度之坚决、立场之顽固、活动之频繁、影响之巨大，在国民党的反共历史上也堪称一流。

在黄埔军校中，他是或明或暗地站在反共势力一边。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他是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的积极支持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先事发难，积极配合。他直接指挥和参与指挥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对湘、赣、闽地区红军的镇压。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是国民党当权集团“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忠实而积极的执行者。抗日